

# 《赘婿》的“一体两面”

□安迪斯晨风

随着郭麒麟、宋轶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版《赘婿》的热播，原著小说再度进入大众视野。然而被剧版吸引来读小说的读者很快就发现，与电视剧相比，小说无论是剧情、角色人设还是蕴含的思想精神都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剧版只保留了原著的剧情框架，在改编过程中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枝裁叶，从而创作出了剧版《赘婿》。

那么《赘婿》的原著小说到底讲的是什么呢？作者“愤怒的香蕉”（以下简称香蕉）曾说过：“文学的核心在于寓言。”在他心中，这部创作时间11年有余，皇皇500万言的网络小说绝不是单纯给人消磨时间的娱乐爽文，而是一条向读者传播作者理念和信仰的渠道，是用“爽文”外壳包裹着的“政治教科书”。所以尽管有读者不理解，但小说中讲的唯物史观才是作者真正想写的，故事情节反而没那么重要。

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小说“上政治课”？所以，必须换一种迂回路线，一开场用一个看起来非常俗套也非常“爽”的开头把读者牢牢吸引住。用香蕉自己的话说，这叫“建立信任感”，靠好看的故事“润物细无声”。所谓爽文，无非就是撩拨与渐进式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故事一开头，香蕉给主角宁毅安排了一个在古代备受歧视的“赘婿”身份，又赋予了他现代穿越者的灵魂。因此当主角轻易使出“抄诗”这一穿越者的“大杀器”，还抄的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千古绝唱时，卑微的身份反而烘托成就了主角高不可攀的文学才

华，让他在文人世家的小圈子里出尽风头。

“扮猪吃虎”可视作爽文套路中最常见又最难学的一招。接下来，香蕉又写出了一个个爽文桥段，譬如让主角学会绝世武功；让他在商战中利用前世学到的手段，逼得竞争对手破产；让他“发明”皮蛋，用此手艺就能大赚一笔；再譬如，让他倚红偎翠，被一个个优秀的女性喜爱……总而言之，狡猾的香蕉像是钓鱼大师一样，用舒缓、精致、慵懒的笔调，写出了一个让人能产生极强代入感的角色，引得读者入迷。

当信任感充分建立起来之后，作者骤施“冷箭”，借着征伐梁山泊以及卧底方腊军等段落，令读者看到了人性中黑暗、残忍、恐怖的一面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本质。小说中一连串有关人物命运的天问打破了香蕉在开头制造出的舒适假象，让读者跟着他开始思考，主角宁毅到底怎么做，才能拯救饥寒交迫的人民大众。

就在读者迷茫的时候，小说的高潮呼啸而来。书中的武朝其实对应的就是历史上的北宋。看似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盛世，实则隐忧不断。面对北方强敌的入侵，就像腐朽的老房子遇到了台风，皇朝被吹得七零八落。幸好还有朝中右相秦嗣源等忠臣良将奋力一击，才把敌军赶出了汴梁城。然而，奸臣在侧，“一腔热血，半缕忠魂，说与野狗听”，一手提拔主角、被宁毅视为恩公的秦相公遭遇了免死狗烹的凄惨结局。

按照饱受规训的古人思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

死”，即便君王昏庸无道、刻薄寡恩，都似该无条件效忠。但在具有现代人意识的主角眼里，丝毫不见天子的“神圣高贵”，看到的只是一个阴狠的凡人。所以他才会在金銮殿上一怒刺杀九五至尊的皇帝，如白虹贯日，石破天惊，随后他举起反旗，要为天下人讨回一个公道。

据香蕉说，在小说刚开始写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金殿弑君”的画面，却只能一直隐藏在故事中，层层布设伏笔，不动声色地一点点把故事推向这个既定的大高潮。他不像现在流行的网络小说作家常做的那样，用一个个小段子串成长篇，而是从始至终都有完整清晰的主线，用一个雷动于九天之上的大高潮，让主角同之前的“富贵闲人”生活告别，进入崭新的故事阶段。

在《赘婿》中，我们能读到作者大段大段的理念输出，特别是小说后半段，几乎变成了哲思录。香蕉坦陈，自己笔下主角所做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藉由先进的理念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种写法无疑非常冒险，但是香蕉已经通过前面差不多300万字完成了对读者的引导或者说“诱骗”，通过阅读这所谓的爽文，宁毅和他所信奉的理念及信仰已经深扎到了读者心中。

在爽文的外表下，用现代的价值观念及信仰撑起小说的骨架，这才是一体两面的《赘婿》正确的打开方式。相比之下，电视剧版只是截取了前半部分温馨的“富贵闲人”的感情戏，舍弃了后半部分厚重的剧情核心，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后人类」时代的人文关怀

□马婧

与网络小说动辄数百章乃至上千章的庞大体量相比，郭羽、溢清合著的“科幻悬疑”小说《脑控》确实显得颇为“袖珍”，而其仅以40余章内容探讨关于技术伦理与人类命运的严肃主题，则显露出当下网络文学写作中日渐浮现的某种“精英化”追求。在作品类型上，《脑控》可算作“硬科幻”与悬疑推理相融合的典型兼类小说文本；在创作原则上，小说不再遵循网络文学的读者“代入”追求和为为主要人物大开“金手指”的爽感机制，甚至以拯救式的个人英雄形象出现的脑科学家陈辰也只是中断了反派科学家的“人口清除计划”，并未如“救世者”那般彻底解决文本所指涉的终极危机：人类意识控制技术。这一结局上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固然可以理解成作者为“生产系列”网络小说作品所做的准备，但更为重要的是，《脑控》主题及其创作形式上的精英化趋向为当前的网络文学批评提供了某种进入纵深角度的窗口。

小说以大流行病、全球化的超级流脑病毒作为制造悬念的核心，这不禁令人想起当下仍未结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当然，更重要的是人类应对诸种重大疫情、饥荒和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0世纪以来，生物技术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疫苗、抗生素以及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为人类解除了已知的大部分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宣告了人类在面对自然选择时掌控自身命运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恰恰与近现代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相关。随着对神学权威或天子圣训的祛魅，人类的生存体验成为构建和确认人生意义的本源，如果将人类的现代性体验视为人类对自身力量以及自我内心系统多样性、复杂性和纵深性的认同与反省，那么或许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指，人类的生存体验不仅为个人生活赋予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然而，也恰似赫拉利发出的警告，一旦技术伦理失范，生物科技、人工智能与算法就会沦为人类自己为了某种残忍的目的而刻意制造流行病的工具。21世纪，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在自己创造的“技术”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从女主人公夏楠寻找丢失的“记忆芯片”而牵扯出的女性创伤，从全球超级流脑疫情到以“智商跃进计划”为名的人口清除阴谋的暴露，包括男主人公陈辰对自我意识自主性的怀疑等都可以看出，《脑控》是一部从技术反思角度切入的对“后人类”时代“人的境况”加以密切关注的人文主义之作。

如果将“疗愈”视作对无法选择的“先天的”“自然的”人类残缺的修补，那么《脑控》中的“科学怪人”针对智商100以下人群的“清除计划”实质上则意味着对具有某种遗传特征或潜能的人类的“后天”选择。在生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21世纪，如何像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警惕的那样，在“治疗”和“改进”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红线，从而指引技术向前者发展，同时对有可能被各种改头换面的“优生学”所包裹的意识形态选择做出严格限制。否则，原本受社会经济影响的阶层系统将转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质化、绝对性的阶级隔离。换言之，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所经历的压抑、孤独、疾病和战争，都是人类这一物种存在的大部分历程中所共同承担的，也恰恰是经由这些苦难才进化生成了人类的全部情感并界定了人类根本的价值观念，使人类保有基本的、共享的人性，从而使所有人类族群更紧密地联结起来。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脑控》对技术伦理的反思指向了从启蒙时代诞生的“进步”“发展”等话语，对启蒙价值观及其权力话语重新进行审视的严肃意指，也将原本通俗化、大众化的网络小说文本，从满足一般读者猎奇消遣、情感代偿和欲望满足的层面，推向了“后人类”时代“人的境况”的深刻探究。主人公陈辰虽然制止了威尔斯的人口清除计划，却仍旧不能阻止资本对大脑意识控制技术的垄断，甚至连对自我意识的自主性也产生了怀疑，这样的结局收束确实预示着人类面临的新的危机：一旦生物“优选”技术与资本或某种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由生物性的鸿沟造成的阶级壁垒将牢不可破。甚至可以想象，一旦以某种潜能作为人类族群生物链条的自然法，那么每当处于底端的族群被清洗之后，新一轮被清洗的必然是曾经处于非底端的“幸存者”；如此往复，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人类必将卷入更为残酷的竞争，使技术不再服务于人之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反而迎来一个等级森严、单一的“后人类”未来。

总之，《脑控》的技术焦虑投射了当下时代的某些生存焦虑和精神焦虑。不论是科学狂人的技术控制，还是制药公司的资本垄断，实质上都是权力控制的不同形式。从启蒙时代起，人就成为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对象，福柯关于“人之死”的论断恰恰道出在毛细血管般的权力管控中人的无奈和对自身主体性的不确定，而这种表现为对身体以及总体性的人口技术性的控制，最终在网络小说《脑控》中得以具象呈现。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小说关于人性、人类总体性及其未来命运的严肃思考和认真书写，已经在某个向度上映射出网络文学写作者自觉的精英化追求和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而作者将人的主体性意识与自我察觉能力视作纠正技术伦理失范的重要途径，也昭示出网络文学作家通过写作重振人文关怀的意图。

# 由“原点”衍生的多重意蕴

□张玲玲



王桂宏长篇小说《原点》在网络连载后，引发了不少读者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回忆。作品讲述了大山深处蟒潭镇两对恋人30多年的情感经历与奋斗过程，展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青年为理想走出大山却又回归大山的人生历程。作品从理想、事业、爱情、婚姻等层面，多角度讲述了主人公陈心诚从原点出发又回到原点的故事。

30多年前，陈心诚实现了人生梦想：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毕业后进入盐南市政府，他凭借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由秘书做起，最终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副区长。改革开放初期，面对金钱、名誉等各种突如其来的诱惑，不少成功人士曾一度迷失自我，陈心诚也不例外。借招标的机会，陈心诚出轨下属却丢了乌纱帽，人也回到了当初曾发誓离开原点：蟒潭镇。爱情上，他与初恋情人因误会分手成为单身；婚姻上，与市委书记的女儿刘玉英因爱结合，却因出轨离婚，再次回到“单身”的原点。

作为主人公，陈心诚是书中着墨最多的人物。他的人生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凭借高考才能进城的许多农村青年们相似。在他的遭遇中，作者凸显了农村人的淳朴、踏实、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而其失败既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也符合人物的身份设定，因此也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陈心诚历经了出山、进城和出城、进山的命运轨迹，如同走了一个圆圈，一番打拼后又回到原点。他的经历如同鲁迅《在酒楼上》里所写的蜂子或蝇子，原本停在某点，被惊吓而飞，但飞了一小圈后又又落回到原点。

小说描述的四个人物中，男性不断为事业奋斗，女性则侧重对其婚恋变化的书写。陈心诚从事业有成到遭受挫折，再到回归乡里；曹爱军高考落榜，通过参军走出大山，然后考军校、立功、失恋，服役期满后又回到故地。几位女性角色中，曹芳被逼嫁给书记之子，离婚后才与初恋情人曹爱军结合，实现了有情人才终成眷属的人生理想；柳芳娟事业有成，但婚姻不幸，与陈心诚因误会分手后嫁给富商，不料对方却是感情骗子，于是辞职、离婚，只身回到家乡，亦回到单身原点。

作品中的蟒潭镇是书中人物的出生地，也是他们人生理想的生发地和情感的孕育地。作者用人物离开大山又回归大山的奋斗历程，完成了离家—回家的“归乡叙事”模式。离家，是为了走出大山实现人生理想；返乡，是为了休整再出发。他们的人生轨迹仿佛一个圆圈，当初拼命想要逃离的家乡，在多年后成了急于回归的避风港。从而，“原点”作为人物事业的出发地与生活的回归地，亦成为了其人生起点与终点交汇点。

最早呈现归乡模式的是鲁迅。其小说人物因谋生离家，又因“惦念”归来。“家乡”是承载主人公童年记忆的家园，也是其精神世界的寄托。与鲁迅不同，王桂宏笔下的故乡是人物真正的精神家园，当他们遇到人生困境时，作者选择将故乡作为其休养生息之地。鲁迅的归乡是寻梦，王桂宏的归乡则是疗伤；前者家园破败荒凉，后者家园富足殷实。因此，同样的圆形结构却揭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与人物命运。

《原点》不以情节取胜，而以主人公陈心诚意识的流动、对往事的追忆为主建构小说框架。当早已走出大山的陈心诚提着旧帆布箱子再度回到出发点，家乡的山川草木引起了他的无尽的回味，思绪也自由地穿梭在现在与过去、中年与青年、人生失败与事业有成、稳定婚姻与甜蜜初恋之间，于是，初恋时的甜蜜、幸福，高考前的期盼、紧张，拿到通知书的兴奋、激动，遇到意中人的暗喜、高兴，工作时的努力、拼搏，升迁后的得意、自信，偷情后的懊悔、悔恨，撤职后的惶恐、自责，决定回归的坚定、决绝等缜密的细节与丰富的心理活动，就在陈心诚时而放飞、时而收回的意识流动、思绪飘忽中完成。意识流的结构设置使河流、场院、独木桥、小广场、枣树林、树皮小屋等成为了情节生发的原点与收结终点，追忆似水年华的出发点与眷恋家乡的回归点，也使小说情节走向因人物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起伏，呈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感伤情绪。

《原点》中，一个具有特殊意蕴的蓝色帆布箱子贯穿了小说始终。这个箱子是陈心诚人生的陪伴者与见证物，即使搬家，他也不曾丢弃，即使因此得罪妻子，也原样保存、毫不妥协。等到他告别辉煌过去重归故里时，这个帆布箱子更是如影随形，跟他一起回乡。陈心诚对箱子的感情甚至超越了其对事业的珍惜、对官位的在乎，乃至对妻子的感情。在他心里，箱子的存在意义及重要性已不再囿于其使用功能，而是承载了他过往生命的全部记忆。发白的帆布箱子记录着他的进城梦，见证了他的成长，寄寓着父母的嘱托和希望，承载着人物的“原点生活”“古远记忆”。在他看来，帆布箱子是他摆脱农村人身份的标志，是他成功考上大学的见证，是父母对儿子的肯定。箱子在，他就能回到过去、回到原点，能回味与父母和睦相处的往昔生活。作为礼物，帆布箱子亦是联结过去与现在的纽带，箱子在，父母亲情就在，自己的根就在。此时，帆布箱子承载的是其青年时期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是人物辉煌时代的大学梦、人生梦。

在艺术手法上，顶针形成的圆形结构与作品所表达的人生经历纷繁复杂后终究回归原点的意象巧妙契合，产生了叙事上的美感。这种结构安排不是相同句子的简单重复与循环，而是古典小说单线发展的现代运用，是循环往复之美的具体表现。

蒋离子的《人间慢步》是蒋离子《糖婚》系列的第二部，小说从新灿教育创始人于新的自杀讲起，塑造了安灿、林一曼、何夕、陆玲玲等四个都市女性形象，再现了“骨感”的现实：爱情、婚姻的不易，欺骗、背叛和反目。从故事中抽身出来我们发现，理性精神始终照耀全文。作者对人物婚恋、事业的反思成就了小说的“别具一格”。理性反思首先表现在作者对现实女性的体察和同情上。在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里，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常常是以牺牲精神的自主和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对物质的贪欲和屈从使得都市男女常处于焦虑、抑郁的非常态，他们往往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只有物欲没有灵魂，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

《糖婚：人间慢步》从本质上说是一部问题小说，它深刻揭露了受到更多现实实践的女性的精神危机。正如主人公安灿所说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难过的能力。”她们丧失了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体认，甚至面对爱情和婚姻的毁灭时，也只会感到无力、无奈、无所谓。在小说第一章结尾处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安灿决定和刘瑞离婚，她目送丈夫离家，“说是不送，到底还是目送着他走出了客厅，目送着他消失在门厅这头。听得那关门声后，她蜷曲在沙发上，随手抓过了一条毯子，此时，她只想好好睡一觉”。在张爱玲的《金锁记》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场景：七巧识破了姜季泽想要骗她钱的把戏，她把手中的扇子掷向他的头顶，酸梅汤也淋了他一身，姜季泽被骂跑后，“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口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蒋离子对这种情感的剥离、激情的消逝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同情。“人说乱世莫负儿女情，其实乱世儿女情更深。”

对婚恋、事业及其关系的怀疑和追问是作者理性反思的第二个层面。网络小说多存在着一种现象：写恋爱的多，写婚姻的多。小说结尾处历经波折的男女主人公终于决定厮守一生，这种光明的尾巴显然是一种片面的情感代偿，“爽”的同时也带来了“瞒”和“骗”的后遗症。婚姻有那么美好吗？蒋离子对婚姻情况的现实确证在不经意间揭露了那些网络甜宠文、霸道文的虚假性，实际情况是，多数年轻人对爱情充满想象，却又对婚姻毫无准备，就像作者在访谈中所说的：“当我们脱下婚纱的那一刻，当我们从进入婚姻生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发现结婚之后，人生才刚刚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面对。”“糖婚”也不过是婚姻的第六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恐怕还会不时出现。

蒋离子对婚姻的怀疑在文学史上亦有渊源，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苏青的《结婚十年》和梅娘的《蟹》等小说，到池莉等作家对婚恋所持的态度，事业的成功是否就意味着幸福？这也是《糖婚：人间慢步》所提出的质疑。小说里于新身为公司总裁，可谓“功成名就”。他住着别墅，有着贤惠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却在公司上市前放弃生命。于新的死具有悲剧性和典型性，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安灿很可能也会走上崩溃的道路。在死亡叙事的背后一直隐含着作者的价值追问，他是在替死去的于新问：是不是值得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去创立一个企业，这样是否值得？此外，小说还对“婚姻和事业的平衡说”提出了质疑，婚姻和事业两者的“平衡”并不容易：婚姻、家庭需要陪伴，而事业就是对婚姻、家庭的抢占和剥夺。借用小说人物何夕的话说，“平衡工作和家庭吗？这两件事，哪能完全平衡呀？”所以在两者难以兼得的情况下，放弃其中一个而倒向另一个就成为多数人的选择。于新和安灿把筹码交给了事业，结果一个自杀，一个变得冷酷、麻木；何夕和林一曼选择了家庭，结果一个丢掉工作，另一个因害怕被抛弃而学习“驭夫术”。该如何解开这些矛盾的“死结”呢？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并没有确定的惟一答案。作者把选择权交给了笔下的人物，让她们摸着石头过河，以不同的姿态走向人生彼岸，这也是理性反思的第三个层面。《糖婚：人间慢步》里的四个女性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中，安灿是有名的女强人，为了事业可以抛弃一切。但当她认清了情感的重要性后，却毅然从公司辞职，从高速运行的事业快车道回归到生活的慢车道。林一曼则恰恰相反，她本来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却转身成为新灿教育的总裁，踏入了硝烟弥漫的职场。就像小说里没有一个绝对正面或反面人物一样，安灿和林一曼的选择也没有谁对谁错，作者以巨大的包容写出了不同选择背后的合理性。这种建立在与不同处境的女性共情基础上的网络写作饱含了人道关怀精神，是真实感人的，既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网络小说常见的简单规定性的超越。巴赫金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时，提出了著名的“复调”概念，意在说明陀氏笔下的“人物挣脱了作者的控制，他们从被表述的客体上升到独立的主体地位，透过思想和语言的狂欢争取到自由言说和对话的权力。蒋离子同样放下了生杀予夺大权，让人物自由表述对婚恋、事业的不同理解，人物命运在不同的逻辑轨道上波动起伏。

《糖婚：人间慢步》引发我们思考：文言文和小作文、小众文和大众文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写作姑且分为感性的情绪写作和理性的情感写作。感性的情绪是动物性的、先天的、瞬时的、简单的、游戏性的，那些浅且白的“爽文”用数百万字的篇幅讲述着满是套路的传奇故事，作品中的“人物依靠着”金手指“征伐攻袭，决不妥协的叛逆和战无不胜的情节背后体现的是情绪化的权力意志，人物的“浅成长”显得虚假而苍白，故事和人物往往只是促进多巴胺快速分泌的诱导剂。而理性的情感是人性的、经验的、长久的、复杂的、文学性的，此类作者在创作时会更多地考虑故事的逻辑性、背景设定的合理性，人物不再是仅仅满足欲望本体的符号而带有了人类情感的体温。相对于弘扬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作品，现实题材网络小说还存在第二种形态，即彰显现实个体的精神世界，把握日常生活的困顿与纠葛。现实题材网络小说要想实现突破，必须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即要回归到文学本身。在此基础上，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才能承担起重塑网络文学筋骨和灵魂的重任。

# 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第二种形态

——以蒋离子《糖婚：人间慢步》为例

□江秀廷

